

江南水乡古镇的遗产价值认知¹

沈山

(上海市社会文物行业协会, 上海 200003)

【摘要】江南水乡古镇反映水网地区人类改造、利用自然, 建立聚居地的发展历程, 承载着江南文化地域特色, 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的典范。文章对照世界遗产价值体系, 构建对江南水乡古镇文化遗产价值的整体认知, 进而选择恰当的评估标准和代表性古镇。

【关键词】江南水乡古镇; 世界文化遗产; 价值分析; 评估标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DOI: 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0.06.059-068

江南是中国区域地理中极为特别且重要的一个地区。从历史上看, “江南”由最初的自然区域指称, 到后来的多重文化符号, 其标识的地理空间和人文意蕴是因时而异、不断变化的^[1]。明清以来, 人们一般用“江南”来指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 包括清明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5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 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部分^[2]。本文的研究对象“江南水乡古镇”是指江南水网地区逐渐发展而成的, 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历史城镇, 2001年作为一个联合申报的遗产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江南平原洼地, 人类“因水而市、枕水而居”, 在人地互动和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作用下,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

国际领域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从“点”的视角发展到“面”的概念。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到1987年的《华盛顿宪章》再到1999年的《保护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和《巴拉宪章》, 以及“文化线路”“文化景观”“文化空间”等概念的引入, 更使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为对自然环境、人工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整体保护。江南水乡一直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整体印象, “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何似浣纱溪畔住, 绿阴相间两三家”, 逐渐形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整体。本文探讨在相近的自然条件、社会网络、经济结构、文化背景下, 江南水乡古镇遗存的空间环境、历史风貌、传统肌理、街巷格局、民风民俗等, 构建对江南水乡古镇文化遗产价值的整体认知, 进而对照世界遗产价值体系, 选择恰当的评估标准和代表性古镇。

1 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分析

江南水乡人民在人工改造的水网格局上建立人类聚居地, 不仅创造了全世界范围内湖泊湿地环境中独特的集约型土地利用模式, 同时由无数专业化市镇共同构成独特的水陆并行的商贸网络体系。在这个系统中, 传统儒家思想与新兴商业思维的碰撞, 打破了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局面, 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造就了江南水乡古镇多元化的文化特征。这里尝试从塘浦圩田、水陆并行道路系统、多层级的市镇体系、士商融合孕育的多元文化、资本主义萌芽的见证、延续至今的传统肌理和启迪文艺创作等方面, 梳理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构成。

1.1 塘浦圩田

¹作者简介: 沈山(1982—), 女, 助理馆员,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E-mail: hntacyshen@qq.com.

太湖流域有史以前是海湾，在长江、钱塘江和海潮的长期冲积下，逐渐形成中部低洼而四周高起的碟形洼地，拥有水高田低的独特地势。自古太湖地区的劳动人民就针对此特点治水营田。在同洪涝灾害长期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塘浦圩田，就成为治水改土的主要方式^[3]。“塘”和“浦”是圩内横贯东西和纵穿南北的排灌沟渠，“圩田”即围田，筑堤以绕田，水行于坪外，田成于坪内，在深挖塘浦时同时产生。“涝则闭闸”“旱则开闸”，不仅巧妙地将旱与涝加以利用，也通过筑坝、设闸、疏通等方法，将防洪、除涝、灌溉等多种功能整合在一起，综合解决了防洪减灾和水资源利用等问题，是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的基础支撑，充分体现了江南水乡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特色。

塘浦圩田在滨湖地带衍生出来的一种以自然圩和墩岛为基础的独具一格的农田水利系统，称之为浚港好田叫在 2016 年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上，凌港圩田已成功入选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可见，这一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水利技术已为世界所认可。

1.2 水陆并行道路系统

河网密布是江南地区的地貌特征之一，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约束和局限，又反过来促进对水的适应和利用。在江南地区史前聚落的选址和营建中，已反映出这种人地关系。如杭嘉湖平原上，海盐仙坛庙遗址、龙潭港遗址、桐乡普安桥遗址、海宁达泽庙遗址、苏州独墅湖遗址等良渚文化遗址，都是在河港环绕的土墩之上。这些河港有些是人工开挖，也有些是直接利用天然河道，用于城市排水、水运交通、生活用水乃至防卫。很多聚落中的建筑沿水道两侧分布，如吴江龙南遗址、湖州千金镇塔地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以水为壕、建筑沿水排布这些史前水乡聚落遗址的布局特征在后期的城址中明显得到继承和发展。

江苏省武进市湖塘镇春秋战国时期淹城遗址，有三重城垣和三条城河，均有水道相连，在子城的南城垣中部、内城西南角和外城的西北角，都设置有水门出入；在其周围还有 6 条水道与外城河连通，并经大通河、古运河流向太湖、滆河和长江^[5]。苏州灵岩木渎古城遗址依山势高下而建，胥江自东北至西南穿城而过，注入太湖，2010 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古城墙、护城河和水城门^[6]。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到，南宋平江城（苏州）以水系为脉络，以河道为骨架，街巷和河道相依附的状况。苏州有规整的八道陆门和八道水门，“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十分有规划，后人认为是以河道为骨架的“水陆相邻、河路平行”的双棋盘式城市格局^[7]。不规则的城邑平面、多重护城河、引水入城、设置水门、水陆并行的城市交通、水门与护城河连通、城市水系与周边水系连成一体等，均是各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和适应江南水乡环境特色修筑的结果。

1.3 多层级的市镇体系

从东汉后期起，特别是进入六朝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开发，江南城市开始崛起，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城市经济日显活跃。进入宋代，尤其是宋室南渡后，以临安（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确立了在全国城市发展中的主导地位^[8]，并且，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也成为江南经济和社会领域变革的重要表现。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江南地区两宋时期先后兴起 886 个市镇，其中镇 240 个，草市 646 个^[9]。陈国灿先生进而将其分为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沿海港口市镇、消费性市镇和乡村墟市 7 种类型^[10]。这 7 类大致可分为 3 个层级。乡村墟市规模小、数量多，广泛分布于各地农村，市场水平低，发展不稳定，属于基层市场。农业市镇主要依靠所在区域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市镇一般以一种或几种手工行业为特色，这两类市镇主要承担着产品生产和外销的职能。环城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沿海港口市镇和消费型市镇，分布于中心城市周边、水陆交通沿线或沿海地带，是货物的集散地和商品的流通中心，生产性商业和手工业水平相对较低。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一个多层级的市镇体系在已初步形成。

历经元初（宋元之交）和元末（元明之际）两个战乱频仍的时期，明代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的停滞与市镇的空前兴盛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杭州府在南宋时只有 16 个镇，到明代后期已增至 31 个，增加了近 1 倍。嘉兴府在南宋时有 6 个镇，如果除去今上海地区的青龙镇和上海镇，实际只有 4 个，到明代后期已有 30 个，是南宋时的 7.5 倍。湖州府在南宋时有 7 个镇，到明代后期已增至 18 个，增加了 1.6 倍^[11]。这些市镇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府县城市的远郊和农村腹地，从侧面反映了江南环太湖流域的工

商业规模和发展水平。

市镇的间距以6~18km为常见的模式，这并非人为的，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木船是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主要交通工具，商家运输产品进入某市镇出往返时间不可能过长。因此，市镇间距过分密，必然会由于商业不振而趋于衰落；过分疏，则无法适应商品集散的需要，必然会兴起新的市镇来填充补缺^[12]。而市镇与周围的乡、村又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形成一个个小经济圈。

作为基层商业市场的市镇通过水系连接成网络后，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除了商品集散功能外，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行业作为经济支柱，形成了以一种主要产品为中心的“一镇一品”格局，在现存的江南水乡古镇中，丝业市镇可以南得、乌青（今乌镇）、震泽为代表；绸业市镇可以濮院、盛泽、双林为代表；松江府各地普遍种植棉花，棉业市镇可以七宝、南翔、罗店、朱家角、枫泾为代表；粮食业市镇可以同里、黎里为代表；交通业市镇如波浦、乍浦等；盐业市镇如新场、下沙、新仓等；编织业市镇如周庄等；漆器业市镇如西塘等。

从一个县的范围来看，市镇专业化分布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是多样性和整体性的统一。以苏州吴江为例，盛泽镇以绫绸业；震泽镇是蚕丝集散地；同里镇则以粮食经营为支柱；黎里镇以粮食业、棉纺织业为主。水乡的基底地理特征与县-镇-市-村经济体系，完美地完成了区域间产业分工的细化，并依托水网，完成了空间上的连接。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古镇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如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得等，已成为江南水乡的缩影与代表。

1.4 士商融合孕育的多元文化

明清时期，儒学价值观发生嬗变，尤其传统的利义观发生转向，由原来的“利义离”转向“利义舍”^[13]。传统儒学渐渐转向入世价值。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士绅退身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转而经商，一部分富商又通过“捐纳”制度买得官位，这带来了士商之间的双向融合。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蓄好殖以故富庶”。《太函集》亦载“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闾儒，则其躬行彰彰矣”“藉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14]可见，商人之家习儒，士人之家服贾，在当时已十分普遍。

一些商人兴建藏书楼，搜集和刻印各种珍本、善本，为士子学人提供学习的资料。国内现存有一定影响力的私人藏书楼，江苏50多座，浙江30多座。范凤书曾统计明清时期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715人，江浙两省就有2029人，占43%，^[15]。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人，其中江南地区合计264人，占总数的66%。

此外，这个时期江南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广泛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丝织、棉织等产业。这种经济结构变化，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工商活动。

士商之间基本价值的趋同、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不仅改变了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也为江南市镇带来了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古镇中广泛存在的店铺、街坊、茶馆、戏台、祠堂、学校、教堂等，都见证了这种多元文化的特征。

1.5 资本主义萌芽的见证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市镇相互联系，结成一个市镇网络，沟通全国各地的市场。伴随着江南农业经济结构变迁，大体上区分为棉织、蚕桑丝织、米粮贸易3类专业市镇^[12,16]。江南市镇一经兴起，迅速繁荣，成为区域手工业、商业中心，是连接乡村和城埠的桥梁纽带。街市往往“工贾艺术杂处”。其中有机坊、染坊、练坊、踹坊等作坊主及手工业工匠，有开设布行、丝行、绸行等牙行的牙俭、行霸，有仰食于市镇脚夫、乐人、市井流氓，有从全国各地到此经商的商客及商帮，有在市街上开设各种店铺的坐贾，有受雇于作坊、牙行的各类专业的雇佣劳动者，有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

[12]。

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微调，以上人口构成体现江南传统城镇经济的生产关系领域，孕育着一种有别于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现象，出现具有一定劳资关系的身份群体，即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虽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遗存至今的“江南水乡古镇”规模和布局也基本形成于明代，也正是上述经济特征的反映。由于大部分江南市镇脱胎于村落而自然形成的，因此其外在的形制主要是地理特征，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人为规划。纵横交错的河道是城乡间交通要道，市镇大多分布于河流两岸，成为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樊树志曾将江南市镇沿河分布的街区分为两大类型：十字港型（沿两河交叉分布）和一河二街型（沿一河夹岸分布）^[12]。一河二街型是江南水乡古镇最典型的布局形制，如吴江盛泽、黎里、惠山古镇等。较大的市镇往往处于两条河流十字相交处，形成十字港型，如南潏、同里、濮院、南翔等。

江南古镇“因水而市、枕水而居”，最开始主要出于生活的便利，而成为人类聚居地。伴随水运交通的发展，丝、棉、米、盐等市沿水而兴，餐、茶、酒、宿各馆依河而建，沿河地带逐渐演变为带有居住功能的商业店铺，成线性顺河伸展。因此，在街市与河道之间的建筑往往为“一进”的上宅下店式，而街市靠街坊一侧的建筑则是前店后宅式的。

1.6 延续至今的传统肌理

在相近的自然条件、社会网络、经济结构、文化背景下，江南古镇孕育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貌一直延续至今。在《苏州市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办法》中，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对象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大方面。其中物质要素，即整体空间环境，包括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即古镇街巷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包括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建筑、传统民居；传统桥梁、廊棚、驳岸、水埠、古井等建（构）物。河湖水系、古树名木囊括在与人工环境相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之中。非物质要素包括民风民俗、传统戏曲、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地名、方言、老字号等（图1）。

“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因水成镇”是江南古镇形成的基本原则，街道多成“井”字形分布。与河道平行的街市大都随着河流的运输作用发展而来，多为商业用地。与河道垂直的巷道比较狭窄，形成与热闹街市截然不同的宁静氛围。以此为骨架连接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店铺、骑楼、过街楼、桥梁、廊棚等诸多要素，有机形成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整体空间格局。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江南水乡古镇中，除无锡惠山之外，其余13个古镇均已进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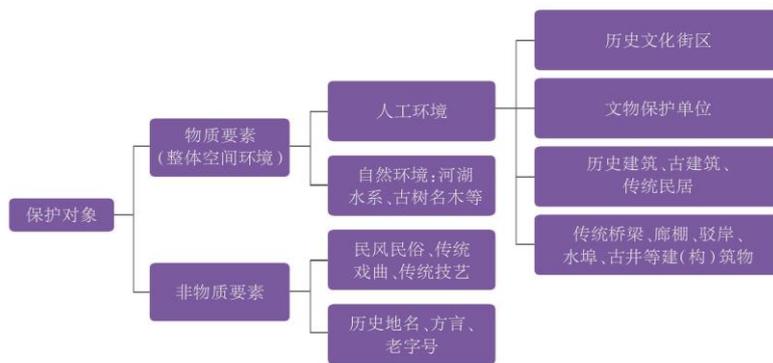


图1 江南水乡保护对象结构分析
(来源: 改绘自《苏州市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办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指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表1 江南水乡古镇中历史文化名镇和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统计

名称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庄	2003年第一批	玉燕堂、敬业堂、耕乐堂	双桥及沿河建筑、叶楚伦故居
用直	2003年第一批	保圣寺罗汉塑像	-
同里	2003年第一批	退思园(丽则女学校旧址)、思本桥	陈去病故居、思本桥、耕乐堂、嘉荫堂
沙溪	2005年第二批	-	沙溪雕花厅、吴晓邦故居
锦溪	2009年第四批	慈云寺塔	陈墓区公所旧址
震泽	2014年第六批	师俭堂	王锡阐墓、香花桥、致德堂
黎里	2014年第六批	柳亚子故居	鸿寿堂
惠山	-	惠山镇祠堂	-
乌镇	2003年第一批	谭家湾遗址、茅盾故居	-
西塘	2003年第一批	吴镇墓	西塘建筑群

续表1

名称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干灯	2007年第三批	秦峰塔	顾炎武墓、余家当铺
凤凰	2010年第五批	杨氏宅第	-

南溇	2005 年第二批	南辛寻张氏旧宅建筑群、尊德堂、嘉业堂藏书楼及小莲庄	-
新市	2009 年第四批	-	刘王庙戏台题记

通过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古镇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并不占多数。很多民居、店铺、茶馆、驳岸、桥梁、廊棚等还担负着生活实用功能，处于日日被使用、时时在改变的状态，每一处场所都凝聚着古镇居民特有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记忆。除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江南水乡古镇的美还体现在民风民俗、传统工艺、传统戏曲等非物质遗产上。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使人们获得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的总体印象。

1.7 启迪文艺创作

建筑家诺伯格·舒尔兹在《场所精神——关于建筑的现象学》一书中表示，场所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点，而是一个具有明晰特性的空间，是一个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场所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得以发生和展开苗 1。特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及特定的人造环境形成了江南水乡古镇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古镇居民世代代与环境的反复作用和复杂联系之后，在记忆和情感中完成了江南文化的自身定位和认同。

水乡古镇中由环境和生活衍生出的各种场景，如小桥流水、杏花春雨、莲叶田田、残月汀洲等，已经不仅作为一种物质形式的生活要素而存在，更是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特有的内在精神。这类的艺术创作包括历代文人墨客如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皇甫松的“兰烬落，屏上暗红燕。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张养浩的“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受荷丛一段秋光淡。”等几千首诗词歌赋，也包括从五代董源“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到明代文徵明的《江南春》，直至当代陈逸飞《故乡的回忆》，以及吴冠中笔下以寥寥数笔勾勒出的水乡诗韵。

当人们行走于古镇的深宅巷道中，站在沿河的廊下岸边，唤起的是与江南文化整体相关的特殊记忆，从而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精神愉悦感。

1.8 价值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江南水乡古镇价值构成的 7 个因素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图 2）。“塘浦圩田”是人地互动的环境基底，它不仅包括农田，还是水利、河道、防御等一整套网格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具江南特色的“水陆并行道路系统”，将一个个村落串连起来，产生农副、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并逐步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位于中心城市周边或货物转运便捷的一些村落慢慢扩大规模，发展成商品流通中心，构成“多层级的市镇体系”。商贸的繁荣带来了士商之间的双向流动，在打破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同时，也将儒家仁义知礼、雅好文艺等理念落到实处，形成“士商融合孕育的多元文化”。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给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了可能，产生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延续至今的传统肌理”是前述 5 个因素外化的表现形式，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正是这些历时层积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在世代代人地互动、记忆韵染过程中，使江南水乡古镇构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整体，不仅“启迪文艺创作”，也带来精神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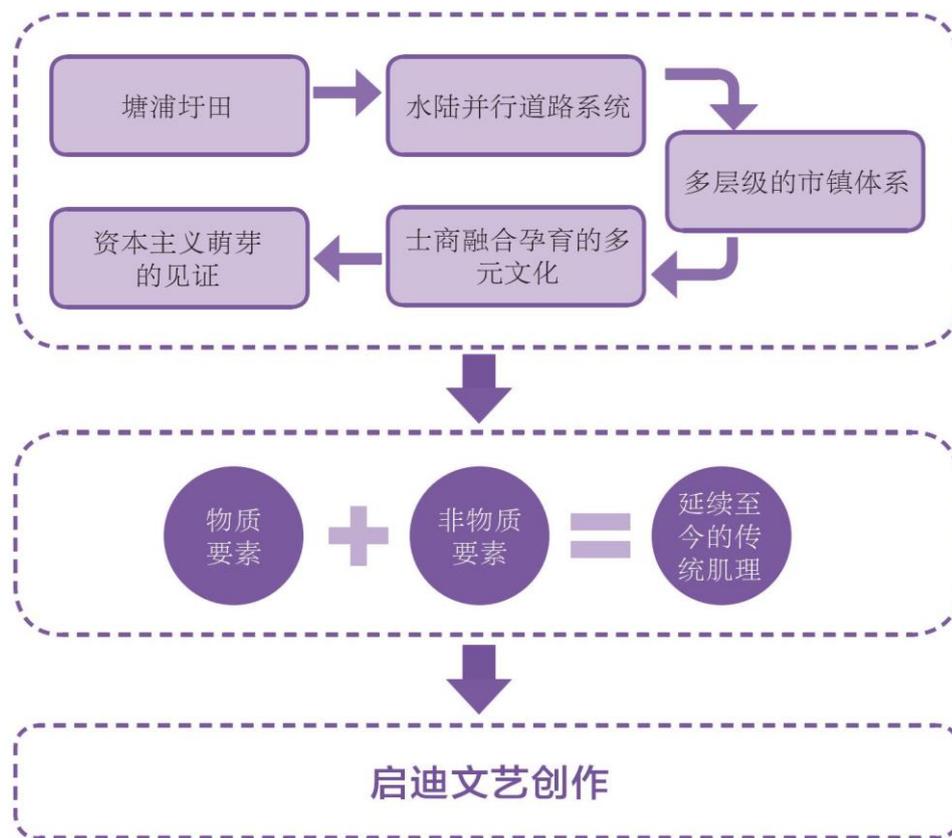


图2 江南水乡古镇价值构成因素层次关系图(来源:作者自绘)

2 申遗策略建议

2.1 确定恰当的适用标准

自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发布以来,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评估世界遗产时的主要依据。按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必须同时具备 3 大基础才能称之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①符合一项或多项 OUV 的评估标准(表 2);②符合真实性、完整性条件;③符合保护和管理要求。真实性和完整性强调遗产要素能完整并真实地反映价值;保护与管理包括立法等保护措施、有效的保护边界、设立缓冲区、适宜的管理体制、可持续使用等,目的是确保遗产的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保存。二者都是基于 OUV 的评估标准。

因此,确定恰当的适用标准是证明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过程。在《突出的普遍价值声明》中,不仅要解释该遗产能够符合所选择的标准的原因,还要说明遗产中能够承载或展示这些价值的属性或特点。

2.1.1 人地互动

江南地区的历史就是人类在湖泊湿地环境中围垦疏浚,不断改造人类生产、居住等土地使用模式,将治水和治田结合起来,使之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过程。“塘浦圩田”和“水陆并行道路系统”最直接地反映了标准 V 所表述的“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统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相关信息,截至 2019 年,以城镇(town)入选的古镇型世界文化遗产共 47 项,其

中满足标准 V 入选的有 11 项，如挪威的勒罗斯矿城及周边地区、加拿大的卢嫩堡旧城、中国的丽江古城、斯洛伐克的历史名城班斯卡-什佳夫尼察及其工程建筑区、西班牙的城墙围绕的历史名城昆卡、越南的会安古镇等。与目前入选的这些古镇相比，江南水系四通八达，人地互动的范围更大。它并非一个单一的古镇，而是一个由无数古镇组成的人类居住地聚落网，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独特性的。

表 2 《操作指南》（2019）中文化遗产的 OUV 评估标准

标准类型	评估标准
	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II	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III	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IV	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V	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脆弱
VI	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2.1.2 人类价值观的交流

标准 II 中的关键词是“人类价值交换”。一项遗产的物质形态，从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等方面来讲，可以说与观念之间的相互交流相关。这些观念的有形传播全部都体现在遗产的特性当中。

同样地处江南水乡地区，不同的地理区域其主导产业各有侧重，产业发展与细分促使市镇合作网络与产业链形成，进而造成了物质与非物质方面的差异化发展。这种交流在横向上表现为“多层级的市镇体系”，即水陆交通线带动下的商品交流、产业布局，市镇在数量、规模和空间形态上的发展，作坊、会馆类特色建筑的建造；在纵向上则表现为“士商融合孕育的多元文化”，士、农、工、商社会层级结构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儒家价值取向与商业思维的双向交流。因此，标准 II 可以用于江南水乡古镇的价值阐释。

2.1.3 人类历史的重要阶段

15—17 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又称“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拉开了世界市场，明清时期的中国凭借丝绸、瓷器、茶叶和棉布等产品纳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中，换取了大量白银。

江南地区在这一时期逐步成为国内面积最大的棉纺织和旅桑丝织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该区域内的市镇之间也形成了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区域性经济交往圈，开始经济结构的突破性转化。

标准 IV 中所谓的阶段可能涉及政治或经济史、艺术史或科学史，且影响深远。该阶段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非常重要是不够的，除非这个阶段对该地区或全球影响范围巨大^[18]。

因此，“资本主义萌芽的见证”如果单从江南地区出现的偶发性的资本主义萌芽角度考虑，显然不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独特

性,但是从明清时期江南水乡古镇产业经济圈的形、发展和近代醴变反映的中国与世界市场体系关系角度,是可以结合标准IV进行讨论的。

2.1.4 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

标准III考虑的是过程:文化传统一般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方能决定某一地缘文化区域内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文明。这种传统可能仍旧存在并依然活跃,或者已经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所见证的就是该传统的纪念物。这种传统可能是建筑方式、空间规划或城市布局,或是无形的但却带来了实实在在有形的结果^[18]。

基于江南地区气候、水文环境,江南水乡古镇因水成镇,在生长过程中并不破坏原有基底,而是对现有的条件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整体风貌相近、各个古镇又不尽相同的总体形态。建筑布局和街道走向并无定式,依地势灵活布置,通过安插天井来解决通风、采光等问题。“延续至今的传统肌理”中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不仅见证了历经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繁荣,也见证了“业商贾、务耕织、咏诗书、尚道义”^[19]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社会意识和民俗风情。

以标准III入选的16项古镇型世界文化遗产,如巴西的欧鲁普雷图历史名镇、墨西哥的乌斯马尔古镇、斯洛伐克的巴尔代约夫镇保护区、西班牙的阿维拉古城及城外教堂、突尼斯的科克瓦尼布尼城及其陵园城市遗址等,它们遗产分布都相对集中。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对象更为复杂,且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单体,而是相互关联的区域性文化景观整体。

2.1.5 清晰呈现无形价值

在47项古镇型世界文化遗产中仅6项遗产采用标准VI,包括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英雄港中心区、肯尼亚的拉穆古镇、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石头城、墨西哥的瓜纳托历史名城及周围矿藏、也门的扎比德历史城镇和巴勒斯坦的希伯伦老城。

此标准所考察的联系并不一定要对遗产本体产生有形影响,却在遗产中得以清晰和直接的表现。例如,一座大山或一处景观可能非常神圣或给人以启迪,一处遗产可能会为画家、艺术家或音乐家带来灵感,或某处遗产可能会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事件有关。这6项中3项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拉穆古镇、扎比德历史城镇和希伯伦老城),3项是与历史事件相关(亚速尔群岛英雄港中心区、桑给巴尔石头城和瓜纳托历史名城及周围矿藏)。相比之下,江南水乡古镇更多的是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艺术或文学作品相联系。

2.2 确定合适的申遗古镇

江南水乡古镇是具有潜在的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然而申遗之路可谓一波三折。2000年,周庄、同里、用直、南得、乌镇、西塘6个古镇启动联合申遗,2001年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按照申遗的游戏规则,从2000年开始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在长长的申报排队名单上,江南水乡古镇从国家预备名录第6位一度落至15位,陷入了一场漫长等待。

在这过程中,一方面,古镇申遗的预备名单一直在不断变动。2006年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同里与南得曾由于资产经营问题意外落选。2012年的名单又在原有江南6镇基础上新增新市、锦溪、千灯、沙溪4个古镇。2015年又增加黎里、震泽和张家港的凤凰3个古镇,并共同签署《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协定》,确定苏州作为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2018年无锡惠山古镇也正式加入申遗行列,申遗古镇增至14个。其中,周庄、用直、同里、沙溪、锦溪、震泽、黎里、惠山、乌镇、西塘10个古镇为申遗文本中的典型例证,千灯、凤凰、南得、新市4个古镇是整个申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江南水乡古镇的完整框架。而2020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网站发布的《守护遗产、共享未来》一文中,江南水乡古镇的申遗名单又有所变动,由周庄、同里、用直、乌镇、西塘、黎里、锦溪、沙溪、震泽、惠山和新场11个古镇组成,也就是2018

年所确定的 10 个典型例证再加上上海市的新场古镇。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新的古镇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加入申遗名单的意愿，如沙家浜、焦溪、孟河、朱家角、枫泾等。

在 47 项古镇型世界文化遗产中，大多都是单独申报，如中国的丽江古城、巴西的欧鲁普雷图历史名镇（Historic Town of Ouro Preto 科特迪瓦的历史名镇大巴萨姆（Historic Town of Grand-Bassam）、肯尼亚的拉穆古镇（Lamu Old Town）等。然而江南水乡古镇虽然具有地域和文化上的共同性，但每个古镇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们在保护开发、资金投入、利益诉求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同。一些开发成熟、配套基础设施完善的古镇希望通过申遗带来影响力，从而带动旅游消费、吸引外部投资，同时也担心伴随申遗而来的各种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诸多束缚。而一些区位优势不明显、因开发较晚而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原生态保护的古镇，也想借申遗契机，寻求发展新思路。各古镇的步调不一致，也增加了协调难度。

《操作指南》中系列遗产指包括或两个以上逻辑联系清晰的组成部分，系列遗产申报的过程，包括对各组成部分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遗产整体的连贯和管理上的可行性^[20]。

《世界遗产申报筹备手册》指出，对系列申报来说，其组成部分所构成的整体的潜在突出普遍价值是申报的基础，必须得到证明。任何系列遗产申报均作为一项单一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果系列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受到威胁，要求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则整个遗产都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应该在充分了解江南水乡古镇遗产整体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从遗产能否展现所选择的标准、是否真实和完整地传达价值、在所划定的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内是否有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等方面展开比较，选择有代表性的古镇进行联合申报，有机整合各个古镇的优势资源，彰显不同古镇的亮点、特点。条件暂时不成熟的古镇可以不放在第一批申报，后续再作添加扩充。

3 结束语

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对其认知决定了保护理念与方式，也决定了其能否得到更为普遍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参与。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程序中，突出的普遍价值是申报的核心和评估的对象，是遗产之所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是需要通过防护、保护和管理得以延续的。比照世界文化遗产的 OUV 评估标准和要求，江南水乡古镇是在水网地区、人类与环境互动过程中，通过集约型的土地使用，建立传统的人类居住地的典型范例，可以考虑以“文化景观”的名义进行申请。

尽管对江南水乡古镇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已逐渐形成共识，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苏州和嘉兴市政府分别出台了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办法，但在比较研究、确定申报的组成部分、整合各个古镇优势资源等方面，不仅需要大量研究工作，更需要借鉴其他联合申报的成功经验，围绕江南水乡古镇的突出普遍价值，各个古镇协同配合形成合力。

参考文献

[1]陈国灿. 江南城镇通史·先秦秦汉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2]冯贤亮. 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黄锡之. 论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成因与变迁[J]. 铁道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5, 12(1):37-42.

[4]陆鼎言, 王旭强. 湖州入湖渣港和塘浦 C 娄港)好田系统的研究[G]//湖州入湖和塘浦(娄港)圩田系统的研究成果资料汇编. 湖州:湖州市水利学会, 2005.

-
- [5]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 [6]徐良高, 张照根, 唐锦琼, 等. 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J]. 考古, 2011(7):19-26.
- [7]陈泳. 城市空间:形态、类型与意义:苏州古城结构形态演化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8]陈国灿. 江南城镇通史·宋元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9]傅宗文. 宋代草市镇研究(下卷)·宋代草市镇名录[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 [10]陈国灿. 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J]. 学术月刊. 2001(2):65-72.
- [11]陈国灿. 江南城镇通史·明代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12]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 [13]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 [14]汪道昆. 太函集卷五五. 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M]/续修四库全书第134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5]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
- [16]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17]诺伯格·舒尔兹. 场所精神:关于建筑的现象学[M]. 施植明, 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 [18]ICOMOS, IUCN, ICCROM. Preparing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s[EB/OL]. [2020-07-15].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5098>.
- [19]阮仪三. 江南古镇[M].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1998.
- [20]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peration a I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019[R]. Paris:UNESCO, 2019.